



“向群众学习”是党的重要工作方法论

——重温任弼时《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 王晓荣



延安时期，为了系统清除党内长期存在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痼疾，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顿党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过程中，党中央注意到一些党员存在思想上缺乏群众观、实践中脱离群众的问题。1943年6月，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后收入《任弼时选集》。这篇文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际，深刻阐释了群众路线对党的领导、理论创新和党性修养的作用，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并提出“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论。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仍具有启示意义。

群众智慧是实现正确领导的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如何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成为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任弼时提出“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论，强调通过汲取群众智慧，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群众的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任弼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创造力的观点提出，“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强调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革命事业相结合，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任弼时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党的政策和决定是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的关键，而正确的政策和

决定必定是符合群众利益、赢得群众拥护、能够动员群众奋斗的。因此，党员要时刻面向群众，在关心群众生活中发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倾听群众迫切需求时争取群众的拥护，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里把握群众工作规律。

任弼时认为，指导群众行动是实现党的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方法，指导群众行动的前提是向群众学习，这种学习不是空泛的学习，而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向群众学习，并应用到指导群众行动的实践之中。他指出，毛泽东是党内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智慧的榜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号召以毛泽东为榜样的基础上，任弼时提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学习。一是在思想维度，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正如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的，改变老一套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二是在制度维度，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把领导机关的计划变为群众的计划。三是在实践维度，克服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

群众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开始走向成熟。任弼时“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论，深刻揭示了理论发展与群众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群众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理论作为认识的一种表现形式，离不开对实践的总结。任弼时依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从“不是读了《资本论》不能解释边币、法币问题，不能做好实际工作，

便是以为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工作中，没有什么理论，不能学得什么理论”等现实情况出发，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倾向，强调“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机械、教条地学习文本内容，而是结合一定的实践需求，学习其中的方法、经验和规律。换句话说，虽然马克思主义从文本上看远离“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具体工作，但其中的方法、经验和规律，却可以有效地指导实际工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体现。在从哲学角度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后，任弼时接着回答了指导实践的理论从哪里来的问题，他指出指导实践的理论是从群众实践中总结规律、方法得来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指导实践的理论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演进。任弼时指出：“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要获得与时俱进的理论就不能自以为是地摸索与乱闯，而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即理论创新须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过程。

对于如何向群众学习，从群众实践中推动理论发展，任弼时也提出了具体路径。一是要求共产党员既要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二是“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

群众观念是强化党性的的重要内容

强化党性是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任弼时“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论，揭示了党员党性与群众观念的内在关系。

任弼时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切入，回答了为什么群众观念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任弼时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强调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有群众观念，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

任弼时详细阐述了党员需要有什么样的群众观念：一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的观念，党员干革命，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深入群众之中；二是“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念，党员与群众之间，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要破除“官老爷”思想，通过向群众学习，掌握实情、改进工作。任弼时将树立群众观念与强化党性紧密联系起来，他批评当时部分党员在处理问题时，观念上没有群众，“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等，认为这些行为破坏了党群关系，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鉴于此，要强化党员党性，树立强烈的群众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唯有扎根群众，党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在全党上下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时期，任弼时提出的“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论依然留给我们很多启示。要始终保持“拜群众为师”的谦逊态度，完善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构建群众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机制，收集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鲜活经验，深入推进“两个结合”，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思想根基上厚植为民情怀，在工作实践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令全球瞩目。在此宏大背景下，《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文版于2013年由中信出版社推出。李光耀被称为“战略家中的战略家”“领导人中的领导人”“导师中的导师”，以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和能力而广受世界各国领导人敬重。他所领导的新加坡地处亚太却横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是个小国却总以大外交纵横捭阖于大国之间。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站位和个人站位，《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所呈现的对当今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洞见给人启发，备受关注。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从全球聚焦的中国快速发展及其未来前景、美国是否会衰落、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对抗冲突、中美这对重要双边关系如何演进等热点话题开篇谈起，但又不局限于此。该书还论及印度的发展优势和劣势，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国家以及东盟国家集群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欧洲和日本的发展，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发展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等，这些国家、力量、问题都是影响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际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在书中，李光耀还讲述了他本人的战略思想、政治思想、人生观等，分析了新加坡发展如此成功的因素以及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所在。

不仅这些重要问题本身值得探讨深究，李光耀围绕这些问题的看法、见解更是不乏深刻之处。比如，关于中国的发展，他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所有国家尤其是中国邻国的对华政策都已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彰显优势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根据中国当前的辉煌成就直接进行推论也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

关于美国的未来，他认为美国目前的的确背负着债务与赤字使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但肯定不会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展现出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其优势包括美国社会注重开拓创新、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能轻而易举地使这些人才融入美国社会等。但如果过于强调个人至上理念，那将使美国社会难以保持凝聚力。他还谈到，总统制下诞生好政府的可能性比较低。如果政府继续在给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时追随欧洲的意识形态导向，那美国肯定会逐渐欧洲化，社会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多。

关于中美关系，他认为两国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两国更有可能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美国国会和政府忽视了两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历史差异，使双边关系的战略考量服从于美国的国内议程，这种冒进的做法可能把美国变成美国的长期对手。他告诫美方不要对中国那么敏感，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这有助于弱化双边关系的对抗性。

此外，李光耀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印度的宪法体制、政治体制、种族结构、选举模式等存在诸多限制因素，这导致印度无法实现高速发展。他还认为，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些民族被边缘化，缺乏安全感。而且当前全球化主要由美国主导和推动，激进分子就把美国视为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这些看法和观点都不同程度地闪现着李光耀的智慧。

当然，重要历史人物也有历史的局限，李光耀也不例外。正如基辛格在推荐序中所说：“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所以李光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李光耀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 高祖贵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

耀观察中国和世界，尽管有时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但在政治上却始终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来评述，这就使其观点难免有偏颇。比如，他认为今后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仍将由美国制定；任何关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解决；等等。这些十多年前的认知和看法，与当下的实际情况和未来中国的发展、美国自身的变化、亚太地区局势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相对照，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些局限之处没有影响《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的重要价值，而且该书在出版形式上也有新穎之处。该书是以李光耀的口述为基础编写的，全书每个章节都首先提出一系列问题，紧接着就是李光耀的回答，思想性和可读性都很强。三位编写者分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助理和战略规划副国家安全顾问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美国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师阿里·温尼，他们都是知名的政要和学者，对所编写的内容都有专业的理解。全书由基辛格撰写推荐序，二十八位世界知名政要和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这些都明显提升了该书的价值。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和引入深入思考的著作。（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第一副校长（第一副院长））



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开卷有益，读书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是更好认识中国的发展，把握世界的变化，提高自身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读书治学版开设《读书》栏目，推荐精选好书，刊发读书心得与读者分享。

开栏的话

事实、实践与创新

——陆定一的治学之道

□ 李曼青

陆定一（1906—1996年），江苏无锡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陆定一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其新闻思想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基础，为新闻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实事求是：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闻界曾围绕新闻是否有阶级性展开过争论。部分理论家认为，新闻必然体现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新闻与资产阶级新闻存在本质区别。陆定一则坚定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出发，指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这一论断犹如黑夜中的明灯，明确了新闻

的客观属性，反对将新闻与某种“性质”混为一谈。

1943年，他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明确提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定义简洁凝练、内涵准确，明确指出新闻的核心是“事实”，而“报道”则是对事实的呈现，在当时众说纷纭的定义中脱颖而出，至今仍被新闻界广泛认可。这一定义的提出，从理论上明确了新闻的本质，为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起点；从实践上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使他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新闻报道的方向和重点。

“我们宣传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新闻报道既真实又生动。陆定一反对在新闻报道中弄虚作假、夸大其词，认为这是对党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任。与此同时，他进一步阐释了新闻应如何做到真实，提出了新闻必须具备的五个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还强调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在新闻采编工作中的重要性。

调查研究：新闻工作者要走好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是第一个实事求是；到群众中去，是第二个实事求是。”陆定一深受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影响，主张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到“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以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42年，陆定一出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改版工作。其间，他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新闻工作者走出窑洞，到群众中去，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而要深入群众，了解群

众的需求和期望。这种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不仅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也增强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陆定一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新闻报道。有一次，他带领记者们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走访了许多农户，与农民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和需求。通过这次调查，陆定一和记者们写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新闻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报道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陆定一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紧密结合整风运动，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挥了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除了在新闻学方面，陆定一在教育领域也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他主张教育绝不能脱离实际，而应紧密围绕国家发展的需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期望，灵活调整教育方针与政策。尊重教育规律、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是教育工作的基石，要真正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内心需求，做到因材施教。

与时俱进：理论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陆定一倡导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为刻板的信条，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理论创新赋予了理论持久的生命力，使其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闻学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需要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更新与完善。在《解放日报》改版期间，陆定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新闻理论观点，如“新闻必须真实反映情况”“新闻必须为人民服务”等。这些观点不

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也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他还强调新闻学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认为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才能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新闻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观点，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956年，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强调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要有独立思考 and 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争论。这一报告的发表，在文艺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对创新精神的倡导，使陆定一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前瞻性和指导性。

古稀之年的陆定一展现出令人敬佩的反思勇气，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当时宣传工作中存在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纠正宣传的形式主义要不搞口号，不搞运动，而要实用惠、细致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勇于反思、敢于纠错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典范。

陆定一对新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理论建构，更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中国自己的新闻学方法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虚假新闻、浅层报道、形式主义文风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重温陆定一的治学理念，有助于我们回归新闻的本质——真实、深入、为人民服务。

